

饮茶起源及

茶树栽培起源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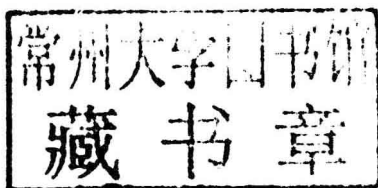
刘家虎◎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饮茶起源及
茶树栽培起源地研究

刘家虎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饮茶起源及茶树栽培起源地研究/刘家虎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109-17035-3

I. ①饮… II. ①刘… III. ①茶-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3069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张 利

文字编辑 吴丽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0.25 插页: 12

字数: 175 千字

定价: 5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刘家虎 男，高级农艺师、客座副教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1963年高中毕业后，主动上山下乡到农村，成为一名知青，在恩施“玉露茶”主产区务农17年，先后担任小队、大队、公社技术员，恩施县农业局农民技术员；1980年成为恩施地区特产局专业技术干部；198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后，先后担任自治州特产局副局长、州农业特产局副局长，利川市委副书记，自治州科协副主席、州科委主任、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内容提要

饮茶与茶树栽培起源于何时、何地，是一个国内外尚在讨论之中的课题。

本书通过对古代文献所记载的饮茶史料进行综合考证，借助考古学、民族学、植被学、中医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地考古发掘报告、民族迁徙史、少数民族语言等资料，辅以民俗调查，对饮茶起源的过程、茶树栽培起源地及起源时间、茶业早期传播的途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全文除导言外，共分十部分。

导言：概述我国古代饮茶史；国内外学者对茶树植物起源、饮茶起源、茶树栽培起源地的研究动态；作者的研究思路及主要结论；研究地的历史地理概况。

正文：第一部分针对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没有野生大茶树的观点，从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千年大茶树生长地点的考证开始，确定了争论已久的“巴山”、“峡川”的地理位置，引出多条史料证明：这里自古就生长有野生茶林。第二、三部分引述《茶经》成书之前的文献资料证明：在研究地地域内，记载有最早的茶叶产地和饮茶方法、第一支有记录的名茶、广泛的饮茶习俗等。笔者通过调查与考证，这里至今还保留有茶叶早期加工的印迹。第四部分引用考古报告对该区域内多个遗址古代气候的描述，对照当今的自然资源条件，结合植被学、冰川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现有山茶科植物的分布状况，得出人类利用茶叶之前这一地域具备原生茶树生长条件的结论。第五部分对从研究地及相关遗址中发掘出的距今 5 700 年前的各式陶杯（包括单耳陶杯），早商时期的尖底杯，商时期的小底尊形杯、扁腹壶等陶器进行比较及用途分析，认为这是古代居民的茶具，为研究饮茶起源及早期传播过程提出了实物证据。第六部分从考古对研究地早期人类活动提供的证据和古代政治军事史、民族迁徙史中，摘取相关资料分析后提出：我国饮茶起源于长江三峡河谷——清江中游河谷地区，逐渐扩大到武陵山区，其时间至迟在距今 5 000 年前；巴人及其先辈最早开始饮茶，此后巴人将茶叶饮用、茶器制作、原始加工方法传到古代的巴、蜀国全境及巴人后裔所到之处，其大范围传播出去的时间至迟在公元前 14 世纪；茶叶原始加工技术至迟产生于公元前 8 世纪。第七部分分析神农部族与茶的有关史料，认为唐代陆羽《茶经》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记载是可靠的。第八部分从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找到古“茶”字的源头：莽𣎵、莽、𣎵、𣎵、𣎵等古“茶”字源自古代巴人语言的汉字记音；茶、𣎵、茶𣎵、𣎵等源自居住在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一带古代苗、“猺獠”、瑶人语言的汉字记音；茗可能是来自居住在武陵山区古代“濮人”对茶称谓的汉字记音，并借助史料分析了其演变过程。第九、十部分通过类比较我国古代文献、西南地区考古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提出了饮茶起始时间往前溯的可能，还对史料中的一些有关内容进行了诠释。

读威廉·乌克斯 《茶叶全书》的点滴体会

(代前言)

当此书二稿落笔之时，侄儿涂识由北京寄来刚出版的威廉·乌克斯（1873—1945）《茶叶全书》新译本（侬佳、刘涛、姜海蒂译，2011年）。此前，虽然从一些专著中了解到乌克斯的只言片语，但阅读全书，毕竟大不一样。仅就其中所论述的饮茶起源问题，浅谈数语，代作前言。

《茶叶全书》是70多年前的作品，据新译本的译者介绍：这部书从考察到搜集资料历时25年，于1935年成书。后来这部著作与另外两部茶叶著作，即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和日本建久时代的高僧荣西和尚的《吃茶养生记》，并称为世界三大茶书经典。我国茶学界的泰斗吴觉农先生（1897—1989）自抗日战争初期起历时10年，3次组织专家、学者译、校该书，终于在1949年出版了第一次译本（据《茶叶全书》新译本“出版前言”），从吴觉农先生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年代还坚持翻译出版，就可以看出此书的价值。

科学总是在不断地前进，人无完人，书也无完书，何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70多年前的作品，总可以找到瑕疵。威廉·乌克斯先生辞世之时，笔者尚为孩稚，按照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以及儒学鼻祖孔子提倡“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处世观点，即使对这一著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通过各自分开表述的形式，不必直言以对。但笔者又想，既然本文是专门探讨饮茶起源问题，而《茶叶全书》又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其中关于茶之起源的观点至今也还影响着西方茶学界，国内许多专家直至十多年前还曾对其关于茶树起源地的观点作过辩驳，今天又有学者重新翻译出版此书，因而再就该书对饮茶起源所表述的观点作客观而理性的讨论，于学术而言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对乌克斯关于茶树植物起源地的观点，吴觉农先生提出了反对意见，此后又有很多专家跟进（见本文“导言”部分）。今天看来，这些反对意见是对的。从宏观上看，一个科学的结论，也总是在不断地研究和讨论中完善的。

关于饮茶的起源，笔者以为，乌克斯先生的观点，受限于历史条件，受限于作者对中文史料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加上缺乏进行系统分析的资料，也有不够准确、互相矛盾之处（以下注明该书引文连同括号内文字均为新译著本文字）：

对茶树栽培始于何时，乌克斯认为：“自从中国西南部居民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以来，不久人们对生叶的需求便与日俱增，其中有些人为了获得茶叶，竟将 30 余英尺高的野生茶树伐倒以采摘横枝上的茶叶。然而当时这种采叶方法，很有将茶树完全伐尽的态势。要避免上述方法所产生的恶劣后果，并且还要可以获得较为方便的茶叶的供给来源，于是人们就根据耕种其他农作物的常识，开始了试探性的茶树栽培。例如，当时的农民看到茶树与胡桃相似，就认为其根深入地下，直至沙砾层才发幼芽。由此得出一个观点，认为茶树在由碎石组成的土壤中生长最合适，沙砾土次之，而黏土则不适合茶树生长。在此之后，茶树便开始播种于四川适合生长的山区，这个时间大约是在 350 年。到了唐代（618—907），饮茶的风气大为盛行，茶叶的需求量激增，农民们便开始致力于种植茶树”（第 15 页）。这段文字在《中国与〈茶经〉》一章之首，显然是把《茶经》中的对野生茶树的描述“乃至数十尺”；对茶树形态的描述“根如胡桃”；对植茶地土壤条件的描述“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对种植方法的描述“法如种瓜”等文字串起来形成的。不仅与原文含义差之甚远，还有对文字的理解错误，也没有提及“这个时间大约是在 350 年”的依据。对“伐而掇之”的理解，也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习俗所致：鄂、湘、黔、渝、川一带大山区，山高坡陡，森林繁茂，农民经常采摘野生植物的茎叶或果实作药用或食用，在采摘高大乔木或长在悬崖边的植物树叶或果实时，常常爬上树，砍下小枝，然后在地上摘取，至今仍有一批野生中药材沿用这种采收办法，即陆羽所记的“伐而掇之”。试设想，把高“30 余英尺”的茶树砍倒后采叶，只从费工耗时这一点考虑，也很少有人会去这样做。【《茶经·一之源》的原文是：“茶

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梔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栝桐，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其中“蒂”，一本作“茎”）。傅树勤、欧阳勛所著《陆羽茶经译注》将这一段文字改写为白话文：“茶，是我国南方的优良树种。它高一尺、二尺，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尺。在巴山峡川，有树干粗到两人合抱，得砍伐枝条来摘取鲜叶。茶树的外形像瓜芦，叶形像梔子，花像白蔷薇，种子像栝桐，果柄像丁香，根像胡桃。‘茶’字的结构，有的从‘草’部，有的从‘木’部，有的‘草’‘木’兼从。茶的名称有五种叫法：一称‘茶’，二称‘檟’，三称‘蔎’，四称‘茗’，五称‘荈’。茶树生长的土壤，以土中杂有风化石碎块的为最好，砾壤次之，黄色黏土最差。一般说来，茶苗移栽的技术掌握不当，移栽后的茶树很少长得茂盛。种植的方法像种瓜一样，三年后即可采茶。”】郭璞（276—324）注《尔雅》中有“树小如梔子”的记载，他不以高大的野生茶树作标本，而以矮丛状“梔子”的树形来形容茶树，仅从这一点就说明此时不仅已有了较多的人工栽培园，还可能出现了初期的台刈技术。长期以来，这里的农民砍灌木林作薪炭，只从根颈部以上砍，不伤树蔕，以便继发新枝，或许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台刈技术。

对早期饮茶习俗，乌克斯这样记述：“中国最早的饮茶方法，正如郭璞（约250年）所述，是将青涩的茶叶放入锅中烹煮。中国最早的对于饮茶方法的改进，正如陆羽在《茶经》（780年）转引《广雅》中所描述的方法：‘凡饮茶，燂茶饼使赤，捣碎至瓷壶中，注沸水于其上，加葱、姜及橘’”（第923页）。这显然是对郭璞注《尔雅》中“可煮作羹饮”的误读。郭璞注《尔雅》之前，三国·魏·张揖【张揖，史无传，据唐初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581—645）考证：张揖为曹魏太和（227—232）中期的博士】的《广雅》中已明确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茶经》所引的《广雅》略有不同，为：“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

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段文字中，“芼”，《礼记》：“芼羹”。郑玄注：“芼，菜也”。《广雅》所记的这种饮用方法，郭璞后来简记为“羹饮”，而《茶叶全书》却理解成“将青涩的茶叶放入锅中烹煮”。书中括号内夹注的时间为“约 250 年”，250 年郭璞尚未出生，《广雅》已成书，《广雅》的文字产生在郭璞出生之前，似有将“萧规曹随”说成曹规萧随之嫌，“改进”一说不能成立。

《茶叶全书》关于茶树起源的论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同时也有中国茶是由印度传入的古代传说，至今仍有若干学者深信中国栽培的茶树是由外国移入的。其中以萨缪尔·白尔顿的印度为茶树原产地的说法最为有力，他认为中国与日本大约在 1 200 年前，由印度传入茶树，并且说茶树只有一种，即印度种”（第 9 页）。乌克斯引述这段文字未标明萨缪尔·白尔顿发表此说的时间，笔者判断，不会早于 1800 年（依据见本书“导言”部分），再向前推 1 200 年即 600 年。即萨缪尔·白尔顿认为：600 年时茶树才由印度引进中国。不知乌克斯为什么又认为这一“说法最为有力”，同为《茶叶全书》第 5 页称“最早的可靠记录”是“4 世纪时，即 317 年左右，晋将军刘琨在给他的侄子、兖州刺史刘演的信中说：‘吾体中愤闷，常仰于茶，汝可置之。’”同时又有：“茶树便开始播种于四川适合生长的山区，这个时间大约是在 350 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最早的可靠记录”否定了“说法最为有力”的观点。

“茗”是古代茶的另一个名称，从暹罗语‘Miang’转为云南土语‘茗’，这是最早把茶当作食物的。布莱特·施奈德博士讲到在公元前数世纪所著的《晏子春秋》中，记载茗茶是与孔子同时代晏婴时期的食物”（第 518 页）。这段文字没有表述如何“转为”，也没有证实到底是云南土语传到暹罗，还是暹罗语转为云南土语，从接下转引的晏婴所食“茗菜”的资料看，只能说明这一“转为”的时间可能在春秋之时，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本文在第八部分将引用古代文献和民族迁徙史的资料，对“茗”作为古“茶”字的由来，提出笔者的观点）。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人的饮茶是从中国西南边陲山区原始的未开化的人那里学来的。这些人总是在户外的炊烟柴火之上，将野生茶树上的青叶放在锅里烹煮，作为饮料，这是最早的起源”（第 899 页）。这条文字也没有提供依据，但文字中提到“锅”，不知乌克斯先

生是否将“锅”和“釜”弄混，如没有，和其在第3页的引文又发生矛盾，“中国茶叶的起源，在传说中应于神农时代（公元前2737年），萨缪尔·保尔（原文如此）认为依照古代习惯和传说，多数药用植物及茶叶的发现，都归功于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位圣人——神农氏，因此推断茶叶起源于神农时代，此种说法应当不是凭空臆断。”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证实，神农时代已出现了“锅”。若文中提到的“锅”是指釜，又没有资料能证实，神农氏在西南边陲留下过足迹。“中国人的饮茶是从中国西南边陲山区原始的未开化的人那里学来的。这些人总是在户外的炊烟柴火之上，将野生茶树上的青叶放在锅里烹煮”的结论，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没有这类记载；从《茶叶全书》中记载其他各国饮茶的历史看，国外也不可能有这类资料。笔者分析饮茶的起源，从所引证的资料看，最先开始饮茶的人群，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其他地域生活的古代居民，并不显得落后，也并不是用锅煮。

《茶叶全书》中关于茶的起源问题只是众多资料中的一个内容，在80万余字的书中也只占一二万字。归并其中关于饮茶起源与传播、茶字字源、茶树栽培起源等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国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动态。有的值得我们借鉴，有的观点，尤其是其中的关键点，未必符合客观实际。

饮茶始于中国，即使对茶树原产地有分歧的学者，也没有否认。中国古代学者对饮茶的起源很早就开始研究，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其深度和广度距现代的研究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留下了大量资料，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全面地进行综合分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中国茶叶发展的近代史，和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华民族遭受灾难时，茶叶产业迅速衰落，也正是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大力种植茶叶之时，此时的国外学者，即使没有主观故意，但关注的重点有变化，也是正常的，更何况还可能有人去迎合商业的需要。今天我们再来研究这些问题时，也应该考虑到产生这些观点的时代背景，不必苛求。

饮茶起源是人类活动，从初始饮用、产业的初兴到传播、发展，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连贯的过程，仅凭一两则史料或孤立的发现很难作出准确的结论。人和茶又是两个主体，研究这一过程一定要先研究“有茶”，再研究“用茶”。研究“用茶”要符合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历

史，符合相关地域的政治、军事史和民族史。在研究中提出的假设与推断，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笔者在前面讨论乌克斯“茗”来自暹罗语，中国人的饮茶来自西南边陲山区原始的未开化的人等观点时，就提到他的依据问题，尤其是接着引述春秋时期“茗菜”的史料，文字中又强调了“西南边陲”，就更令人怀疑这是由他的茶树植物或原产于印度、或中国、或中印交界一带观点所演绎出来的。依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和所阅及的考古资料，也认为这一结论与西南边陲的早期历史存在冲突。在《茶叶全书》有关茶的起源的论述中，几乎都显露出这一矛盾。

乌克斯关于茶树起源和饮茶起源的观点，和笔者所读到的其他国外学者的观点一样，受到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文知识的局限，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终究是在学术研讨的范围内，后来的研究者应该是先用其所长，再论其短，目的只有一个：还原历史的真实。

2011年10月

目 录



读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的点滴体会（代前言）

导言	1
一、对陆羽《茶经》中野生大茶树生长地的考证	14
（一）“巴山”考	15
（二）“峡川”考	17
（三）关于野生茶林的记载	21
二、对早期饮茶方法的考证	25
（一）唐代以前有关饮茶方法的记载	25
（二）“五味汤”及“擂茶”	26
（三）“油茶汤”，古老的饮茶方法	29
（四）“罐罐儿茶”的历史	31
（五）茶叶早期饮用与“煮盐人”关系密切	35
三、对三峡地区早期“茶事”的考证	38
（一）茶业史上记录最早的名茶	38
（二）唐代三峡地区已成集中连片的贡茶产区	42
（三）关于民间用茶的记载	42
（四）清江中游一带留存有茶叶早期加工的印迹	43
四、三峡及清江河谷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	51
（一）自然资源现状	51
（二）考古资料对古代气候和环境的描述	54
（三）关于鄂西南山地原生茶树生长环境的探讨	57
五、考古发掘提供的实物证据	63
（一）三峡地区人类控制性用火的遗迹	63

(二) 清江中游及三峡地区诸多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 其中单耳杯及尖底杯尤其引人注目	64
(三) 关于尖底杯用途的探讨	70
(四) 宝山遗址商时期遗存: 扁腹壶	85
六、巴人的兴起与茶业的早期传播	88
(一) 大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 至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 这里一直有古代居民居住	88
(二) 饮茶起源的背景与条件	91
(三) 茶业早期传播是由巴人在迁徙过程中完成的	95
七、关于神农部族与茶的讨论	106
(一) 关于《神农食经》	106
(二) 神农部族与巴人	109
(三) 传说与地名遗存印证了“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的记载	111
(四) 神农部族与巴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114
八、“茶”字的由来及演变	115
(一) 巴人语言遗存与土家族语的联系	115
(二) 武陵山区土家语、苗语对“茶”的称谓	117
(三) “𣎵𣎵”是巴人语言中“茶”的汉字记音	118
(四) “茶𣎵”、“苦茶”的由来及演变	121
(五) 《神农本草经》中的“苦菜”	124
(六) 藟、茗等古“茶”字的来历	127
九、对人类利用茶叶起始时间的讨论	132
(一) 古籍对饮茶之始, 说法不一	132
(二) 对人类利用茶叶起始时间的讨论	134
十、对茶树栽培起源地的探讨	138
(一) 古籍记载及专家们的研究成果	138
(二) 确定大三峡地区是茶树栽培起源地的依据	140
(三) “饮茶始于巴蜀”释	144
主要参考文献	147
后记	149

导 言



一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由采集野生茶叶到人工栽培，由食用、药用到饮用，人们利用茶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浏览古籍，有官员以茶“疗疾”的记载，如晋代并州刺史刘琨（270—314）《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吾患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四、《湖北通志·物产》）；君王则“密赐‘茶薺’以当酒”（《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宋徽宗赵佶还撰写了《大观茶论》（《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文人不仅人离不开茶，还认为诗也离不开茶，陆游《饭罢碾茶戏书》中有：“手碾新茶破睡昏”；曹邺《故人寄茶》则认为：“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曾巩的一首《尝新茶》：“麦粒收来品绝伦，葵花制出样争新。一杯永日醒双眼，草木英华信有神。”既说到新茶的特点，又咏出了品茶的愉悦（三段诗文引自钱时霖选注《中国古代茶诗选》）。

普通百姓不仅把茶当成了生活的必需品，“柴、米、油、盐、酱、醋、茶”被称为“开门”的七大要件；茶叶还是农家的收入来源，白居易有《竹枝词》：“江陵市上卖珠花，妾爱珠花插鬓斜。郎若去时千万买，拚与三斤‘麦颗茶’”（沈阳，《土家族地区竹枝词三百首》），可以为证。

据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地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中考证：“是知自秦人取蜀（前316）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黄汝成集释本）。记载在距今2400年前的战国中期，饮茶已在我国古代巴、蜀国居民中盛行。前59年，西汉·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是茶叶入市贸易最早的记录。晋代（265—420），“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证明“贡茶”已达到相当数量。到了7世纪，饮茶已流行于南方广大地区，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中有：“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同时列出了40多个产茶的州郡，并对各州郡所产茶叶的品质进行了比较。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

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又，“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杨华则记录：“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资(jī)，数千里不绝于道路”(《膳夫经手录》)。到北宋时期，“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临川集·议茶法》)。

茶叶不仅满足了人们生活上的需求，茶业生产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我国历史上，茶叶从8世纪后期起，就一直被朝廷确定为专门管理的高税率商品。唐德宗贞元九年(794)，“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贩者十分税一”(杜佑，《通典》)。“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旧唐书·食货志》)。

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茶还影响到民族的安危。顾炎武在《日知录之余·卷二》中记载：在宋金对峙时，“金史，……元光二年省臣奏，……茶本出於宋地，……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余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国乎？”金主为此发布“禁茶令”：“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金人首领为战胜宋，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有蓄茶者可以自用而不得买卖馈赠，其余的人饮茶则判刑五年，足见茶叶贸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

茶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就连一生潜心研究药物的明代大药物学家李时珍也为之感叹：“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本草纲目》，“茗”条下)。

宋代实施的榷(què)茶买马政策和明代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茶叶成为中央皇室向北方游牧民族换取战马的重要战略物资，这对增强宋、明两朝及以后的军事实力，巩固边防，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人们利用茶叶的历史过程中，除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外，还传承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

留存了以唐代陆羽《茶经》为代表的近百部茶叶专著以及记载有野生茶树和茶叶利用、种植、加工技术等“茶事”的大量文字资料，其中仅“茶书”在陆羽《茶经》之后就有：《茶述》、《茶谱》、《茶录》、《茶疏》、《茶解》、《茶说》、《茶考》等，还有清·陆廷灿的《续茶经》；

系统地保存了自唐代以来国家管理茶叶生产、销售的相关法规；

数十种茶叶加工技术被继承、发展，很多品种已经成为今天的“地方历史名茶”，如蒙顶茶、西湖龙井、庐山云雾、武夷岩茶、恩施玉露、普洱茶、

信阳毛尖、六安瓜片……（庄晚芳，《中国名茶》）；

伴随茶叶的饮用，出现了众多与之相关的诗、词、歌、赋、绘画等文艺作品，以及将饮茶作为一种文化修养的茶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不同民族差别迥异的饮茶习俗，如土家族的油茶、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擂茶、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等，已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今天地方旅游文化的“亮点”。

作为一种农作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如此丰富的内涵，表明了茶叶对于人类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其作为农作物的使用价值，它衍生出了一种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文化。这一特点，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作物栽培史上是罕见的。茶成了中国的“国饮”，由中国传播出去的茶叶已与咖啡、可可一起，成为当今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直到 19 世纪初，谁也没有质疑过中国是茶的祖国这一结论。

二

茶树起源问题的争论是从近代开始的，由此也引起了饮茶起源问题的讨论。

1823 年前后，英国军人勃鲁士（R. Bruce）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了野生大茶树后，“1838 年又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列举他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多处，其中沙地耶发现的一株野生茶树高达 43 英尺，胸围 3 英尺。为此，勃鲁士断定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理由是印度有野生茶树”（《中国茶经》，第 16 页）。但“闵天禄（2000）等遍查了英国各大标本馆后未发现来自阿萨姆地区野生大叶茶的确切记录”（陈进、裴盛基，《茶树栽培起源的探讨》，载《云南植物研究》，2003，增刊 14，第 33-40 页）。

自 1910 年起开始考察东方各产茶国的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在 1935 年成书的《茶叶全书》中综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观点：“茶起源于中国，在本章开始已经提到，但就植物学的观点而言则又有了问题。多数科学家和学者对于茶树究竟是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在 1823 年印度发现土生的阿萨姆种以前，很多人曾经煞费苦心地将中国茶种输往印度。同时也有中国茶是由印度传入的古代传说，至今仍有若干学者深信中国栽培的茶树是由外国移入的。其中以萨缪尔·白尔顿的印度为茶树原产地的说法最为有力，他认为中国与日本大约在 1 200 年前，由印度传入茶树，并且说茶树只有一种，即印度种。中国茶树之所以树丛矮短及叶片细小，是因为与原产地距离遥远，受不同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爪哇植物学家科恩·斯图亚特博士，关于茶的起源曾著有论文。他遍览关于在中国边境（包

括西藏、云南及缅甸等处未开发的山区)所发现的野生茶的各种文献,而后作出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茶的起源地的的问题能够解决,则必是在中国边境无疑。在文章中他也曾提到,法属印度地区也可能是最初茶园的发源地。”“自然茶园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季风区域。至今尚可发现野生或原始的茶树,在暹罗(泰国的古称)北部的老挝、东缅甸、云南、上交趾支那(交趾支那位于越南南部,柬埔寨东方)及英属印度的森林中都可以看到。因此茶可以被看做是东南亚(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原有植物。在发现野生茶树的地带,虽然存在着政治上的边界——云南、印度、缅甸、暹罗等,但终究是人为划分的。在人类还没有划分这些界线时,这一区域早已成为原始的茶园,当地的气候及雨量对茶树的繁殖非常合适,促进了茶树的自然繁殖”(依佳、刘涛、姜海蒂译,2011年,第9-10页)。这两段文字是乌克斯《茶叶全书》中《茶的起源问题》的全文和《自然茶园》的一部分,该书作者认为:茶树植物起源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

193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植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H. И. Вавилов)根据搜集自全球各大洲近60个国家的数万份品种材料进行详细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同时列举出各个中心起源的大田作物、果树、蔬菜及其近缘野生的物种600多个。瓦维洛夫认为全世界“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是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及其毗邻的低地”。在所列举的起源于中国的作物种类中,有“112, *Camellia sinensis* (L.) O. Ktze. (*Thea sinensis* L.) ——茶”(《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琛译,第15、23页)。

1974年,在斯里兰卡长期从事茶叶研究工作的英国学者艾登博士(T. Eden)在其所著的《茶》一书中提出:“茶树(*Camellia sinensis*)人工栽培已有悠久历史,然而它呈野生状态的原产地众说纷纭。在中国的东南部,茶叶作为一种饮料无疑已有2000~3000年的历史,但从来没有人提出在中国境内发现野生茶树的报告(Ukers, 1935)。虽多次有人作出过发现野生类型的论断,但这些和发现的茶树群落极大可能是过去长期以来所栽培的遗迹。如果认为是现在已有的各种类型茶树生产的东南亚地区,那么很可能茶树是从伊洛瓦底江发源地附近的一个中心向外传播,并呈扇形散布到中国东南部、印度支那和阿萨姆的。据华尔特(Kingdon - Ward, 1950)的见解,很可能这个地点还是次生性的,土生茶种的原产地还要往北”(原著为第三版,197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编译组译,1981年,第1页)。艾登在同一段文字中,既提出了茶树“很可能”原产于伊洛瓦底江发源地(伊洛瓦底江在缅甸境内,发源处为我国云南省境内大盈江、龙川江及其上游——原书译者